

中共四川省委党校
四川行政学院

教授学术文库

丛书主编 刘毅



凯歌与奋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发展研究论文集

王科著



四川大学出版社

中共四川省委党校 教授学术文库
四川行政学院

丛书主编 刘 毅

凯歌与奋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发展研究论文集

KAIGE YU FENJIN:
ZHONGGUOTESE SHEHUIZHUYI
FAZHAN YANJIU LUNWENJI

王 科 著



四川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宋颖
责任校对:张伊伊
封面设计:墨创文化
责任印制:王炜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凯歌与奋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研究论文集 /
王科著.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8.6
ISBN 978-7-5690-1922-3

I. ①凯… II. ①王… III. 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
会主义建设模式—文集 IV. ①D61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16876 号

书名 凯歌与奋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研究论文集

著 者 王 科
出 版 四川大学出版社
地 址 成都市一环路南一段 24 号 (610065)
发 行 四川大学出版社
书 号 ISBN 978-7-5690-1922-3
印 刷 成都时时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成品尺寸 148 mm×210 mm
印 张 8.875
字 数 274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9.80 元



- ◆ 读者邮购本书,请与本社发行科联系。
电话:(028)85408408/(028)85401670/
(028)85408023 邮政编码:610065
- ◆ 本社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
寄回出版社调换。
- ◆ 网址:<http://www.scupress.net>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中共四川省委党校 四川行政学院
教授学术文库编辑委员会

主任 刘毅
成员 郭伟 周治滨 李新
杨颖 吴志强 李翔宇
编务 许彦 杨恒雨 樊小平

自序

自 1974 年高中毕业后，我的人生轨迹大概可以描述为：两年下乡知青（民办教师），4 年部队军旅（侦察班长），7 年校园学子（校学生会主席、市学联执行主席、研究生年级长、兼职厂长助理），近 30 年机关政研、高校教师，省委党校、省行政学院讲师、副教授、教授（兼省政治学会、科社学会、统战学会理事）以及数年厂长、经理。

其间，我曾数年兼职于企业管理岗位或停薪留职“下海经商”“办管实业”“商旅美国”，1999 年后回归校园，专注教学科研写作，培训公务员，指导在职研究生和全日制研究生，撰文呼吁社会的全面发展和转型。

在此期间，我先后主讲课程 20 余门，包括在本（专）科生、在职研究生、全日制研究生的政治与公共管理等学历学位班，在科处级公务员、国有企事业单位高管人员和党政领导干部培训班等，讲授政治学原理、国际政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管理心理学、青年心理学、公共关系学、科学社会主义原理、科学社会主义经典著作、毛泽东思想概论、邓小平理论、现代政治学、政治学文选、比较政治制度、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与开发等课程以及政治文明与政治体制建设、民主政治建设、当代西方政治思潮、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教训、转型期的中国廉政建设、反腐败案例分析与廉政建设、健全对权力运行的有效制约监督机制、对现阶段私营企业主政治诉求的调查与分析、国际政治与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亲历美国等专题。

除此之外，我还先后承担各级研究课题、调研报告 20 余项（包括国家“九五”重大课题 1 项、国家社科基金资助课题 2 项、中央调研课

题 1 项、省部级重点课题 8 项、市级课题 7 项、省党校系统重点课题 1 项、校级课题 3 项）；写作和发表论文及调研报告 120 余篇；获各级优秀研究成果及教学奖 20 余项（包括省部级一、二、三等奖 8 项）；独立或合作出版著作 20 本（包括《政治心理学》《现代政治学引论》《国际政治学的理论与实践》《当代西方政治思潮解析》《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价值取向和价值体系》《沉重的历史话题：拒腐防变的新思考新举措》《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阶段的政治体制创新研究》《邓小平的时代观及其创新——改变中国和影响世界》《社会主义的历史前提与历史命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研究》《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三个代表”与党的政权建设方略》《“三个代表”与党的执政方式和领导方略》《“三个代表”与对外关系方略》《“三个代表”与党的统一战线和群众工作方略》等）。

这本文集选自我在 1995—2015 年间发表的文章，按照论题间的逻辑关系及文章发表时间编辑而成。其主旨是要反映我在全球视野下，对我国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的经济与政治发展、改革和转型，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曲折历程和经验教训等，所做的一些关注、思考、探索，亦能大体反映作者自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的主要思想和研究轨迹，以及关切所在。

花开自有花落时。退休之际盘点自高中毕业走向社会大舞台以来的这些事业与奋斗历程，自觉没有蹉跎岁月、碌碌无为、懊悔人生；还算是经历过、努力过、奋斗过，做了自己想做而能做的事，在人生的海滩上留下了属于自己的一点点思想浪花；尤其在改革开放和发展转型的新时期，尽了一个教师和学者应当担当的责任；始终不渝地坚守了自中学（处于“文化大革命”时期）以来对天下大事（势），尤其是对社会政治文明与发展的浓厚兴趣和担当。

于此，我要感谢自身所供职的中共四川省委党校、四川行政学院，其不仅为我的理想、事业和职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平台，而且为退休教授提供了一剂展现学术成果的良方——出版“教授学术文库”。因此，才有了这本论文集，其形成的时间跨越 20 余年，聚焦于当代中国政治发展和转型。这个文选既是我个人以自己的职业、经历、方式和视角，

观察、思考、参与和见证中国改革开放 30 余年的阶段性总结与回顾，又是我充满希望继续关注中国改革开放、提档转型新阶段新征程的新起点。

因此，我还要感恩我们有幸处在这样一个惊天动地的大转折、大开放、大变革、大发展、大转型和大融合的伟大时代。

王 科

2016 年 3 月 18 日于成都

目 录

以劳动效益为中心，实现按劳分配原则	(1)
探索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多元收入分配结构和调节机制	(8)
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我国信用消费与信用保障模式	(13)
市场经济全球化与涉外经济的体制改革	(21)
市场经济发展进程与世界经济、政治格局演变大势	(28)
世纪之交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及对科学社会主义提出的新挑战	(35)
共处、双赢：当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历史与现实选择	(46)
中国的综合国力与国际政治定位——兼论邓小平“有所作为”思想	
	(54)
从王宝森事件谈我国的权力制约监督机制	(65)
反腐必须加大治本力度——2000年反腐案的分析与警示	(70)
国有企事业单位腐败问题的成因及影响特点	(81)
我国公职人员职务消费存在的问题及原因探析	(84)
制度文明：政治文明的核心	(95)
我国政治体制改革进程的阶段性特点及原因探析	(102)
论“从严治党”	(111)
试论社会转型和政治体制改革进程中党执政及领导方式的转变	
	(119)
完善执政党的领导机制探析	(129)
依法治国框架下加强党的执政行为规则建设的几点思考	(136)
对新形势下我国政权职能的再认识	(140)
现阶段我国行政问责制的特点、局限和出路	(148)
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塑造规范、透明政府	(157)

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切实保障司法的独立和公正	(171)
中国城乡发展不平衡的政治分析	(185)
关于建设新农村进程中的政治保障与政治发展的思考	(194)
经济现代化与国民素质现代化	(203)
论社会主义新时期的理想建设	(210)
试论首脑个性对社会政治运行的影响及其优化和控制	(221)
试论政治发展和政治建设的价值体系及价值取向	(242)
重构中国政治发展的多维价值取向及核心价值群	(250)
再议改革目标与改革走向的四种思路	(253)
十八届三中全会与我国公务员制度的全面改革	(256)
附录一 王科论著及转载和获奖目录	(260)
附录二 王科论著获省部级奖项目录	(271)

以劳动效益为中心 实施按劳分配原则

—

我国在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对如何贯彻实施按劳分配原则，做过曲折而努力的探索，明确提出了按劳分配就是要按照劳动者给全社会提供的劳动数量和劳动质量，来决定劳动者个人的报酬。按这样的尺度，又相应实行了计时工资制、计件工资制、工分制，以及体现劳动质量、劳动特点等差别的奖金、岗位津贴和福利等报酬形式。按劳动数量和劳动质量这个双重尺度来衡量不同形式劳动的劳动价值，无疑比列宁曾提出的“计算劳动和产品”完善了一步，尤其是劳动质量尺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列宁晚年探索提出的分配与经济效益挂钩的思想。劳动数量尺度，既包含了劳动时间数量，又包含了劳动产品或作业数量。而劳动质量尺度，则既包括了直接生产单位的产品质量，又包括了机关事业单位和服务等行业的工作质量。人们以为，有了这数量和质量尺度，按劳分配原则就能得以正确贯彻实施了。然而，实践的结果却仍然形成了事实上以自然劳动时间为中心，甚至是唯一尺度的分配格局，从而导致了平均主义的产生和劳动生产率的低下，使得社会主义劳动者缺乏持久的劳动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为什么呢？原因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1) 在产品生产具有高度指令性和计划经济情况下，直接从事物质生产的单位和个人，并不能直接感到必须把自己的劳动质量和效益同收入相挂钩的压力。生产单位的重心自然向数量尺度倾斜。

(2) 马克思讲的直接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分配劳动报酬，是以完全的共产主义公有制和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为前提的，由于现实社会主义缺少马克思讲的这两个前提，因而，直接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进行分配，也就成了一个难以量化、难以比较的尺度。特别是在政治挂帅的年代，工作者的贡献往往变成了政治标准的附属品。同时，只有劳动数量，尤其是自然劳动时间数量，对广大工作者是最具体的、普遍的尺度。这样，对工作好坏的考察重心，自然也就向规定的自然工作时间尺度及政治表现倾斜。

(3) 在上述情况下制订和实施的统一工资制，一方面片面理解了巴黎公社制定的国家官员工资不高于普通熟练工人工资的原则，使之在工资级别上没有拉开多大距离，反映不出复杂劳动和简单劳动、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等的差别；另一方面，由于上述体制的局限，对劳动者和工作者工资级别的晋升，也自然难以做到主要依据实际贡献，而是依据时间年限和政治表现。从而产生即便是因为能力、成绩晋级了，只要他不犯大错误，也不论他是否还是继续发挥作用，就不会导致其报酬减少的现象。在广大农村，则是只要出够一天工，便记上一天工分，至于一天出了多少力，劳动质量、效率如何则很少人问津。反正到年底结算才知道一个劳动日值多少钱，大家按自然劳动日数量获得报酬。之后一段时间曾辅之实行奖金和岗位津贴制度，以弥补已形成的平均主义，但后来被当作资产阶级法权而取消了。

(4) 以上三个原因方面，使得劳动数量和劳动质量的双重尺度最终演变成全国唯一通行的自然劳动时间尺度，进而深刻渗透到劳动与报酬的方方面面。于是，工龄往往成了对劳动者提薪、调级、晋职、分房、享受特定待遇的决定性因素。而其他因素，如个别劳动时间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差距、劳动质量、劳动效益、贡献实绩、劳动能力、脑体差别等都退居次要地位。这自然就会造成事实上的保护保守、掩盖落后、繁殖惰性、扼杀进取、压制革新、窒息创造等现象。人们的劳动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失去了利益的内在驱动力，便只有靠经常性的政治鼓动及政治评比来鞭策劳动者。事实证明，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以自然劳动时间为按劳分配中心尺度，不仅不能很好地贯彻实施社会主义

的按劳分配原则，而且还产生了极大的弊端。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改革大潮发端于农村，而农村的改革始于包干到户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一变革举措的实质，就是把农民个人劳动的最终结果——农产品产量和质量同农民的收入直接联系起来，按劳动凝结形态进行按劳分配。用农民自己的话说就是“交够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全都是自己的”。农民的劳动积极性、主动性由此而大增。随着改革从农村推向城市，一些集体、国有企业开始实行各种责任制，尤其是企业承包责任制，将国家、企业和劳动者个人所得都同效益直接挂钩，终于在不同程度上打破了平均主义和大锅饭的分配格局，为我国改革和经济发展注入了前所未有的活力，初步践行了列宁的将社会主义发展的动力机制从政治热情转化到对个人利益的关心和经济核算上来的构想。随着改革的继续深入，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实行独立核算、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分配上完全或主要依靠企业效益和个人实际劳动贡献。这就冲破了以自然劳动时间为中心的分配尺度，而将各项具体制度，尤其是分配制度的改革最终指向了可量化可比较的“效益”二字。实践证明，凡是通过改革把劳动分配同劳动效益挂钩的单位和地方，其劳动生产率就显著提高，挂钩得越直接越紧密，往往提高幅度就越大，越有发展的活力。可以说，改革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要重新解决如何把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分配利益同全社会、集体和个人的劳动效益更好、更直接地挂起钩来。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然要求我们从观念、实践和体制上，将按劳分配上的尺度从以往被扭曲的以自然劳动时间为中心转到以劳动效益为中心上来。十四大明确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更进一步从理论和实践上提出了确立以劳动效益为中心的按劳分配尺度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原因有如下几点。

第一，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落实到具体的单位或个人，只能体现为劳动效益。劳动效益自身的含义，是指单位时间内单位或个人所生产的产

品。劳动效益好的单位或个人其在单位时间内生产的产品的数量和质量高于其他单位或个人，换句话说，也就是低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反之，则高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因此，按劳动效益进行分配，也就体现了马克思讲的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进行分配的思想。

第二，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与运转，必将使生产经营单位和相当大部分的原事业单位直接进入或不同程度地面向市场。而市场通行的唯一法则就是：各种形式劳动所创造的劳动产品和成果都在市场中进行公平竞争和公平交换，以实现自己的价值。生产经营单位若以更低的产品或服务成本，更优的质量在市场交换中实现了自己的劳动价值，则生产经营单位和劳动者的效益就好，可供分配的那一部分利润就更多；反之就越少，甚至出现负效益，企业发不出工资，甚至资不抵债，陷于破产境地。可见，面对市场法则，自主经营和自负盈亏单位不能不将组织生产、组织流通、组织服务和组织分配的全过程都纳入提高劳动效益的尺度里。生产经营单位即使有一流的质量，但若没有市场需求，也等于零。可见，在市场面前，劳动时间、劳动质量、劳动数量等要素都退居次要地位，劳动效益作为最后可量化、可比较的劳动凝结形态，才是在按劳分配的具体实践中最通行、最具有可操作性、最具有决定意义的尺度。

随着市场经济和现代社会的发展，劳动分工和劳动形式越来越细密，越来越多样化，劳动的特点、性质、地区和行业差别也越来越大。这在客观上也使原本以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个别劳动时间或自然劳动时间为衡量体系在度量分配上变得更加困难，更加不好操作。科研工作者在科技上的重大突破，一部优秀电视剧播出后所产生的巨大社会效益，优秀企业家的经管决策和管理，教师对人才的培养和国民素质的提高等，都难以简单地用八小时工作制或其他时间来衡量其劳动价值。总之，除了国家公务员、生产线工人和必须实行严格坐班制的那些人仍需以劳动时间作为衡量劳动的基本要素外，在国民经济主战场的广大领域，最适用、最合理、最易通行的尺度也只能是对劳动效益的核算。也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促使广大劳动者尽其所能地为社会，也为自己做出最有效的劳动贡献。

当然，确立以劳动效益为中心的衡量尺度，并不单纯是以经济效益为中心，也不是以效益为唯一的尺度。社会文明形态和社会生产客观存在的相互统一的两大部类，必然决定了劳动效益是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直接效益和间接效益的有机统一。所以，考虑集体和个人的劳动效益，必须从这两个方面的相互结合进行评判。一般来说，对直接从事物质生产和为经济活动提供直接服务的劳动，以经济效益为主要尺度。若出现因片面追求经济效益而有损社会效益的情况，则需由社会法律的、行政的、舆论的、经济的机制加以约束和规范。对直接从事精神产品生产的那些劳动领域来说，社会效益则是主要的衡量尺度，并力求做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兼顾。

由于劳动形态、方式和行业的千差万别，若单将效益尺度作为按劳分配的原则，显然也是不够的。有的劳动形式，如国家公务员工作、国民基础教育工作、基础性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理论研究、代表国家水平的文学艺术和体育工作等，其劳动价值并非是要直接通过市场来实现的，而是往往要经过较长的时间才间接反映出来。即便是在直接从事物质生产的劳动领域，有相当多的劳动方式只是整个集体劳动中的某一环节和部分，其个别劳动价值是凝结在集体总劳动效益之中的。因而，在总效益的框架内，还需要辅之以劳动质量、劳动数量、劳动时间、劳动岗位、劳动责任和特点这样一些尺度来综合决定其个别劳动的价值与实际贡献，从而决定其相应的劳动报酬。如可实行计件制的企业，其单个劳动产品的价值由企业总效益而定，而劳动者个人收入的多少，则主要由个人之实际完成的产品（或作业）件数与质量来确定；在国家机关，公务员的工资总额应随整个国民经济效益和社会发展水平的增长而相应增长，但地区之间和个别公务员之间的实际收入差别，则可能通过工作时间、担任职级、工作质量及完成目标管理责任制的状况等差别来决定。可见，以效益尺度为中心，并非是要排斥其他形式的劳动尺度，也不是对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和个别劳动时间理论的否定，而是围绕效益，确立和完善一整套合理性高、适应性广、操作性强的综合衡量体系，以尽可能地保证按劳分配原则得到真正、正确地实施和体现，克服和消除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以自然劳动时间为唯一分配尺

度，造成的严重弊端和缺憾。

三

明确确立以劳动效益为中心的按劳分配综合尺度，对于当前和今后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加速经济与社会的良性发展，具有现实和长远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首先，它能为解决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实施和体现好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提出明晰、有效的思路；也能为在多种经济形式下必然产生的多种分配形式，以及一些劳动者和一些地区的一些劳动行业、职业的工作人员依靠合法的、更好的劳动效益而先富起来提供实践依据。

其次，它将促使全社会和全体劳动者，在观念和实践上进一步摆脱单纯以劳动时间或劳动数量、发展速度（而忽视生产和发展效益）来简单、片面衡量其劳动价值，进而决定分配差别的误区，鼓励生产经营单位和个人将社会劳动和个人劳动的评价重心转到以劳动效益为中心的整个过程之中。这种导向鼓励的不再是对社会劳动的简单时间投入、劳动力或体力投入、资金和资源的投入；不再是出工不出力、论资排辈；不再是分配上的盲目和简单的互相攀比；不再是只顾数量和速度，而忽视经济效果和社会效果。它必将鼓励人们注重对知识和科学技术的投入；鼓励善于劳动和巧于劳动；鼓励改善和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和运转机制；鼓励劳动经营者注重核算有效投入与有效产出之比；鼓励劳动者各尽其能地为社会多做贡献，依靠更好的劳动效益能够先富、敢于先富，并带动越来越多的人都逐步富起来。

再次，它为不同形式、不同方式、不同行业、不同地区、不同性质和特点的劳动，如何合理地实施等量交换提供了一套较适用、通行和有效的衡量尺度；也为解决由于城乡劳动、脑体劳动、复杂与简单劳动、管理与生产劳动、技术与资金含量高与低的劳动、各行各业各地区因生产力发展水平等差别因素而必然带来的收入差别，提供了防止简单攀比

和拉开收入差别档次的实践依据。

最后，以劳动效益为中心的分配衡量尺度，必然会使投入或面向市场竞争的所有生产经营和服务单位乃至全社会，都要求对劳动用工、人事和工资分配制度进行深入改革，也必然要求社会尽快建立和完善相应的社会保障机制，促使社会主义充满生机、活力，实现高速、高效的良性发展。

原载：《社会主义研究》，1995年第4期。

转载：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1995年第9期。

入选：《中国当代社科文献》（1990—1995年卷），1996年版。

探索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多元收入分配结构和调节机制

一、市场经济必然形成多元分配结构和方式

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分配是联系生产和消费的中间环节，是保证社会扩大再生产顺利进行的中间环节。收入分配关系是否协调、合理，直接关系着社会经济生活的效率，社会经济的增长，人们生活的提高，社会的公平、稳定以及社会总需求和总供给平衡等重大社会经济问题的解决。不同的社会经济体制会形成与之相适应的分配模式，并以不同方式深刻影响着一个国家社会经济和政治的总体运行。

在我国传统的高度集中控制型计划经济体制下，分配模式是以如何实现中央行政计划管理为前提，以与国家对劳动的行政调拨相适应，行政权决定了收益权，形成了国家统一确定分配标准和通过行政办法对个人消费品实行直接地总量控制的局面，加之计划经济体制排斥了劳动力和其他生产要素市场，使个人劳动在行政安排和计划下成为获取消费资料的唯一手段。而这一切又在理论上被误认为是马克思所设想的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及其所体现的唯一形式，所以在实践上长期实行主要以劳动时间为衡量标志（不是以劳动效率和劳动业绩为主）的，单一的按劳分配结构和工资加福利的单一分配方式。由于计划经济消除了其他非劳因素参与分配的可能，以及单一的分配模式又存在严重的平均主义，从而使国家的行政控制既保证了社会收入分配的大体平均和社会稳定，又相当程度上满足了我国社会大众长期受小农经济影响的平均主义心理。